

# 西潮衝擊下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

• 孫邦華

1840-98年這一時期，西潮東漸中國，既是兩個世界和兩種文明的第二次激烈撞擊，也是世界現代化浪潮對中國的第二次衝擊。在這次西潮衝擊之下，晚清社會思想觀念開始發生了緩慢的嬗變。「變局觀」就是在受到西潮影響的開明士大夫中逐漸孕育出的、與傳統思想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新思想觀念，一股影響久遠的社會思潮，且是洋務思潮和戊戌維新思潮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朦朧地感覺到西方「紅夷」東侵，時局因之而「變」，而與他同時代的徐繼畲、黃鈞宰則是最先喊出「古今之變局」論的人。但是，當時士大夫大都將中英《南京條約》視為一紙萬年和約，並未真正感覺到來自西方的威脅，「古今之變局」論在鴉片戰爭之後的近20年裏猶如空谷足音，沒有產生多大的社會影響。

變局觀是有關世界與中國形勢的一種時局觀，是當時的士大夫對中國所處的國際局勢的認識和態度。戰爭——西潮之一，它是國家間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科技等綜合國力的較量。十九世紀下半葉，日益衰落的大清帝國不斷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武力侵逼，外患頻仍，這一方面造成了中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半邊緣化)的深淵，另一方面打破了「天朝帝國」與「文明世界的隔絕狀態」，促使部分士大夫「從歷來的麻木狀態中」驚醒。變局觀首先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產生的。

中國歷史上儘管也曾屢次出現過外族入侵的情況，但結果是，這些外族入侵者或被強大的華夏族征服或安撫(如漢、唐等)，或被先進的華夏文化所同化(如魏晉、元、清等)。對於這些從海上而來的西方列強，一些先進的士大夫不得不驚呼是中國數千年來從未遇到的強敵，既無法戰而勝之，也不能羈縻安撫，便以「變局觀」來稱呼這樣的時代。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談及東南洋時指出：「紅夷(即西人——引者注)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為西洋之都會。地氣天時變，則史例亦隨世而變。」<sup>①</sup>如果說魏源還只是朦朧地感覺到西方「紅夷」東侵，時局因之

而「變」，而與他同時代的徐繼畲、黃鈞宰則是最先喊出「古今之變局」論的人。徐繼畲說：「南洋諸島國，葦航閩粵、五印度，近連西藏。漢以後、明以前，皆為弱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為歐羅巴諸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sup>②</sup>秀才黃鈞宰也認為：「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國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琛航賈，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sup>③</sup>非常明確地表述了外敵入侵造成時局的變化這一意蘊。但是，當時士大夫大都將中英《南京條約》視為一紙萬年和約，並未真正感覺到來自西方的威脅，「古今之變局」論在鴉片戰爭之後的近20年裏猶如空谷足音，沒有產生多大的社會影響。

1858-60年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外患加深。自60年代起，開明的士大夫再次發出「古今之變局」論。江南名士馮桂芬說：「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sup>④</sup>1864年，遁迹香港的王韜指出<sup>⑤</sup>：

當今光氣大開，遠方畢至，海舶估艘，羽集鱗萃，歐洲諸邦幾於國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載，互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

時任兩江總督的洋務大員李鴻章驚呼：「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沉胥耶？」<sup>⑥</sup>清廷中主持洋務事業的恭親王奕訢也說：「今日外國逼處於中國都城，而又濱海沿江要害之區，節節盤踞，實為創局。」<sup>⑦</sup>70年代以後，外敵侵略加劇，更多的士大夫把它與變局觀聯繫起來。1874年，湖南巡撫王文韶指出：「竊維中國之有外患，歷代皆然，而外洋之為中國患如此之烈，實為互古所未有。變既出於創見，議論遂無所適從。」<sup>⑧</sup>1878年，出使英法俄國大臣曾紀澤認為：「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sup>⑨</sup>。中法戰爭爆發之後（80年代），中華民族危機加深，變局觀再次凸顯出來，成為士大夫的共同呼聲。1884年，賦閒在籍的郭嵩燾指出：「西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sup>⑩</sup>。1886年，朱一新也說：「今日之時勢，從古未有之變局。」<sup>⑪</sup>迄至1898年，洋務派後期領袖張之洞認為：「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sup>⑫</sup>

洋務官員是「古今之變局」論的鼓吹者，康有為等維新人士也繼承了這一思想。188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一書〉中指出<sup>⑬</sup>：

竊見方今外夷交迫，……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於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於西；俄築鐵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於南，以取滇、粵；……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變局也。

自此至1898年，康有為在歷次「上書」及〈殿試策〉、〈變則通通則久論〉等政論文章中，都強調中國面臨「古今之變局」的問題。1898年，譚嗣同說：「中國艱危，

中法戰爭爆發之後，中華民族危機加深，變局觀再次凸顯出來，成為士大夫的共識。1884年，賦閒在籍的郭嵩燾指出：「西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迄至1898年，洋務派後期領袖張之洞認為：「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康有為等維新人士也繼承了這一思想。

曾土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變。」<sup>⑩</sup>同年，南學會會長皮錫瑞也說：「今五大洲通而為一，乃古來未有之奇變。」<sup>⑪</sup>唐才常、徐勤、劉楨麟等人都曾強調過變局觀。此外，王韜掌教的上海格致書院學生在他們的徵文中也一再闡述這一論點<sup>⑫</sup>。如1888年，錢志澄說：「自道光季年，中外通商，帆檣所至，無遠弗屆。創千古未有之奇局，辟千古未有之奇境。」<sup>⑬</sup>1890年，俞贊也認為：「今日之勢，匪特前古歷朝所未有，實開闢來未有之局。」<sup>⑭</sup>

「奇變」、「奇局」、「變局」、「創局」、「奇境」、「世變」、「大變」等詞，都是用來表示對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中國之後，所引起的國際局勢大變動的一種認識。據王爾敏的統計，1840-1902年間提出變局觀之言論的士大夫不下81人<sup>⑮</sup>。其中，李鴻章等洋務派，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早期維新派，康有為等維新派，生平多次言及變局觀，有的不下十次之多。81人中，王公大臣三人，督撫大員八人，上層官員11人，佔17%；一般京官九人，地方官和使領參隨人員17人，中下層官員佔32%；科甲出身的一般文人（舉人、秀才、貢生）24人，約佔30%。以變局觀言論分布的年代來看：40年代三人，佔3.7%；1860-82年，28人，佔34.6%；1884-98年，49人，佔60.5%；1902年一人，佔1.2%。由此看來，「古今之變局」觀在晚清具有濃厚的社會基礎（地方官員和一般文人佔據多數），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運動時期，變局觀成為一股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在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戰爭到百日維新期間，達到高潮。

變局觀是晚清開明士大夫在西力東漸之後對時局所作出的一種思想反應，但這並不是它興起的唯一動因。實質上，變局觀還蘊含了十分豐富的西學因素。

## 二

變局觀是一種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變易思想的世界觀，是「變法自強」的思想基礎。但是談「古今之變局」的人，並不都是贊成洋務自強或維新變法的。如湖湘名士王先謙早在1879年時也就提出了變局觀。他說：「及咸豐末，泰西諸國紛至沓來。俄人起交乘要約市。邇來倭國狙伺，日甚一日，合十數國之從以構難中土，實為千古未有創局。」<sup>⑯</sup>他後來卻是極力反對維新變法活動的頑固份子。原因何在？我以為，外敵侵略只是變局觀產生的一個原因，而且並不是主要原因，變局觀是否會成為「變法自強」的思想基礎，主要看他們對西學的認識和態度。換言之，變局觀思潮的形成，最重要的是它以晚清輸入的西學為知識和理論基礎。

歷史地理知識是世界觀中最基本的知識基礎。中國傳統的變易觀是一種以舊的「天下」觀這一地理知識為思想基礎的。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士大夫逐漸形成了中國即世界、世界亦中國的天下國家觀念，《詩經》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便是這種觀念的集中概括。迄至明代，當西方早期殖民者開始世界地理大發現的時候，中國的士大夫由於對世界地理知識的缺

「奇變」、「奇局」、「變局」、「創局」、「奇境」、「世變」、「大變」等詞，都是用來表示對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中國之後，所引起的國際局勢大變動的一種認識。但是談「古今之變局」的人，並不都是贊成洋務自強或維新變法的。如湖湘名士王先謙早在1879年時也就提出了變局觀。變局觀是否會成為「變法自強」的思想基礎，主要看他們對西學的認識和態度。

乏，其天下觀變得更加根深柢固。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曾對之作生動的描繪：「他們的世界僅限於他們的十五個省，在它的四周所繪出的海中，他們放置上幾座小島，取的是他們所曾聽說的各個國家的名字。所有這些島嶼加在一起還不如一個最小的中國省大。因為知識有限，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為奇了」<sup>②</sup>。這種天下觀既把中國視為地理上的中心，也看成文化、政治中心。當利瑪竇把歐洲人繪製出新的世界地圖展示在中國士大夫面前時，一開始引起了他們的極大興趣，但是，這些所謂的以衛道自詡的正統士大夫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嚴重問題：「中國當居正中，而〔該〕圖置〔中國〕稍西，全屬無謂。」<sup>③</sup>因而表示強烈反對。為了避免與中國傳統觀念的衝突，利氏經過巧妙安排和精心設計，把中國置於地圖的「中心」。這樣，儘管滿足了中國士大夫自大和虛驕的文化心理，但是利氏暗自卻對華夏文化中心論的「天下」觀念進行了十分尖刻的批判：「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則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sup>④</sup>西方地理學知識第一次東傳中國所引起的衝擊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此後很長時間裏士大夫也就繼續在傳統觀念的束縛中停滯不前。

到了晚清，伴隨西力東漸，西方新的世界地理歷史知識再次傳入中國，如鴉片戰爭前後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選撮要每月統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遐邇貫珍》(以上為傳教士所辦報刊)、《新釋地理備考》、《貿易通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萬國地理全集》、《地理全志》等書刊；60-80年代的《中西聞見錄》、《格致彙編》、《萬國公報》、《西國近事彙編》(以上為傳教士所辦報刊)、《希臘志略》、《羅馬志略》、《萬國史記》、《大英國志》、《萬國通鑒》等書刊；90年代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中東戰紀本末》、《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地理初階》、《地理初枕》、《地理說略》等等。這些世界史地著作旨在「終言萬國建業之始，疆圉之分，沿革變遷之故，山川民物之名，即荒陬僻壤之區，披發赤裸之輩，舉全輿所有者，莫不了若指掌，以資後學之人，廣其見聞，拓其民志也」<sup>⑤</sup>，不斷為那些開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提供了解世界的視窗，並逐漸促使他們在世界觀念上發生着變化。譬如，徐繼畲利用他當時在福建辦理通商事務、與西人交往的便利條件，着意搜求西人所著圖書、地圖，特別是親自與西人訪談，由此了解到大量世界各國歷史地理知識，而撰寫出了晚清第一部介紹西方各國歷史地理情況的著作《瀛環志略》，成為喊出「古今之變局」論的第一人，朦朧地感到了西力東漸是大勢所趨，傳統的「天下」觀已發生動搖，並表現出即將為一種新的「世界」觀所取代的徵兆。與魏源相比，徐繼畲儘管沒有明確提出「師夷」(即學習西方)的口號，但是，魏源並沒有走出「天下」舊觀念的藩籬，徐繼畲則開始突破舊的「天下」秩序觀。首先，徐氏在《瀛環志略》中基本上已刪去「夷」字，其次，他在書名上拋棄過去慣用的「海國」(「海國」是「四夷」的別稱)，而自創「瀛環」，表稱「世界」，並且把中國置於瀛環之中，當作世界的一部分來看待<sup>⑥</sup>。60、70年代之後，更多的人(如王韜等)從那些記敘域外的地理書刊中知道了「九州之外復有九州」的廣闊世界<sup>⑦</sup>，中國中心觀開始發生動搖。如曾經入上海英華書館從傅蘭雅 (John Fryer) 「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

徐繼畲撰寫出晚清第一部介紹西方各國歷史地理情況的著作《瀛環志略》，成為喊出「古今之變局」論的第一人。他開始突破舊的「天下」秩序觀，在該書中基本上已刪去「夷」字，並在書名上拋棄過去慣用的「四夷」的別稱「海國」，自創「瀛環」，表稱「世界」，把中國置於瀛環之中，視為世界的一部分。

的鄭觀應<sup>②</sup>，在批評中國中心觀時指出：「若我中國，自謂居地球之中，餘概目為夷狄，向來劃疆自守，不事遠圖。」<sup>③</sup>戊戌變法期間，皮錫瑞之子皮嘉祐作《醒世歌》一首，云：「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傍？」<sup>④</sup>變局觀也就開始被一大批士大夫所津津樂道，早期維新派、維新派由此知悉了泰西、俄羅斯、日本等國因變法而興盛富強，懂得了「變」是人類公理、世界的普遍現象。

如果說世界史地書刊的面世為變局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識基礎，那麼，國際法知識的傳入則是這一新的世界觀念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sup>⑤</sup>。國際法是以西方的習俗慣例和國際條約為基礎而逐漸形成的一種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和理論，反映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係的要求和世界一體化的歷史趨勢，很顯然，它是與中國幾千年來長期形成的以中國中心觀為核心的華夷秩序觀念和朝貢體系相根本對立的。儘管中國人對西方國際法的態度和看法因人因時而不同<sup>⑥</sup>，但是它對當時比較開明的中國人的固有傳統觀念的衝擊確是無可迴避的事實，因為它從理論上回答了洋貨、西人、西學的東漸，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種理論與鴉片戰爭以來西力不斷東漸中國的歷史事實一起影響了觀察世界、盱衡時勢的中國人，如王韜認為，「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sup>⑦</sup>，不能再固守「嚴中外，控戎狄」的舊觀念<sup>⑧</sup>；董琪也說：「今天下五洲合一，萬國聯交，開上下五千年未有之風會，創東西九萬里莫大之商局。」<sup>⑨</sup>初步感受到了世界一體化的歷史趨勢。鄭觀應從國際公法中進一步懂得中國乃世界中的一國，而非世界的中心，他說：「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他從理論上回答了洋貨、西人、西學的東漸，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國際法知識的傳入則是這一新的世界觀念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如鄭觀應從國際公法中懂得中國乃世界中的一國，而非世界的中心，他說：「公法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繫，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它從理論上回答了洋貨、西人、西學的東漸，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西學傳播不僅僅指書刊上的精神形態的文化知識，還包括物質形態的西方現代工業產品。因為這些工業品是現代生產力的結晶，是物化了的西方文化。晚清士大夫首先就是從堅船利炮這一先進的軍事產品認識西方<sup>⑩</sup>，由此而產生「師夷長技」、「製洋器」的思想。隨着國門被西人的堅船利炮轟開之後，洋貨大量湧入。特別是西方的火車輪船、洋槍洋炮、電報通訊、機械工具、煤氣電燈等現代物質文明成果，陸續輸入中國之後，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同樣有較大的衝擊。道光末年，人們對洋貨的看法已發生改變，開始以洋貨為時尚了。「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洋乎洋乎，蓋洋洋乎？」<sup>⑪</sup>士大夫中，甚至有人將西方鐵路、輪船、電報等物質文明與變局觀聯繫起來理解。曾任蘇州知府的吳雲說：「火輪車路，乘坐者以為安穩快速，極口稱揚。此

千古未有之奇境，天方啟之，人力焉得而遏之。」<sup>④</sup>盧贛章指出：「不謂五十年來，開千古未有之局。以汽舟汽車，聯萬國為一家，電報新聞，列邦而晤談於一室。」<sup>⑤</sup>

變局觀之所以成為洋務論者的共識，也是與寓華西人的大肆宣傳和鼓吹密不可分。60年代初，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威妥瑪(Thomas F. Wade)在上總署的《新議論略》中指出：華洋通商交往以來已經「中外互結」、「不能分論」，「今時與古」相比，形勢已發生變化，不能「仍執成見」。他一方面借用中國傳統的「變易觀」來說明變通的必要，另一方面又用西方進化論批判中國人的歷史循環論。他說：「中華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蓋查進華〔化〕之約，英、法、俄、美各國，以其五百年前與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況較前甚強，以目今與前五百年相比，則目今較五百年前愈強。」<sup>⑥</sup>林樂知(Young J. 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來華自由派新教士在上海《萬國公報》、天津《時報》、《直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大肆宣揚中西通商貿易對雙方的好處，說中外通商是大勢所趨，西人來華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通商和傳教。林樂知指出，英國之富是「由於通商、製造兩大端」<sup>⑦</sup>，並建議中國學習歐美講求製造、貿易等工商致富之法，發展與西方通商關係。他說：「中國苟能將全國中所產之物精求種植、製造、懋〔遷？〕之法，實非歐洲、美國所能望其項背者矣。」<sup>⑧</sup>李提摩太明確指出「振興商務實為當今要圖」<sup>⑨</sup>，他甚至也把自道光、咸豐以來的通商互市的時局稱之為「奇局」，他說：「乃自道咸以來，海禁大開。西瀛各國，聯袂來華，陸則有火車，水則有輪船。山川失其險阻，風雲遜其迅速。開四千年未有之奇局。」<sup>⑩</sup>

總之，在以上幾種因素「合力」的影響下，使得萌生於鴉片戰爭時期的變局觀到了洋務運動時期終於發展成為一種有系統的時局觀，並為維新派所繼承。這是一種與當時頑固派所奉行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守舊觀根本對立的變易進化的歷史觀。說它是一種變易進化的歷史觀，是因為它已蘊含有若干進化論史觀的因素，因而不等同於傳統的「變易」觀。

### 三

十九世紀世界科學三大發現之一的生物進化論，被稱為「促成思想方式上的另一次大革命」，達爾文成為「十九世紀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因為「自然選擇的假說，第一次給進化的舊觀念提供了一個可以接受的基礎，使人類思想在它的無盡旅途中走上一段漫長的行程」<sup>⑪</sup>。西方進化論思想不僅存在於生物學中，而且廣泛存在於地質、化學、天文學(宇宙理論)、哲學、歷史等學科中。

至於說變局觀中已蘊含有若干進化論史觀，首先是因為這一理論形成的知識基礎——世界史地知識——理所當然的是以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石；其次，隨着西學傳播的不斷擴大，西方近代各種科學知識陸續傳入中國，其中，特別是在介紹地質學、天文學、生物學、化學等學科中含有十分豐富的進化論知

說變局觀中已蘊含有若干進化論史觀，首先是因為這一理論形成的知識基礎——世界史地知識——理所當然的是以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石；其次，西方近代各種科學知識陸續傳入中國，其中特別是在介紹地質學、天文學、生物學、化學等學科中，都含有十分豐富的進化論知識。

識——地質古生物進化、天體演變、物質變化等。1873年，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新聞，首次介紹了達爾文(文中譯稱「大蘊」)的生物進化學說<sup>②</sup>。同年，美國新教士瑪高溫(D. J. MacGowan)與華人學者華蘅芳合譯的《地學淺釋》一書，則通過地質層中的古生物化石較詳細介紹了生物進化論，說明地球是「屢經變化的舞臺」，並據人類先祖所使用的工具，將人類文明發展史分為石刀、銅刀、鐵刀三個階段，從而述介了歷史進化論思想。如：「銅刀期後於石刀期，而鐵刀期又後於銅刀期。可見人之智慧日開，故能易石刀以銅，易銅刀以鐵，然其石刀、銅刀、鐵刀非各處同時交易，其間亦有先後焉。」並提到了拉馬克、達爾文等人的學說<sup>③</sup>。1883年，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丁韞良(W. A. P. Martin)著的《西學考略》一書，再次介紹了西方地質進化論、生物進化論，特別是對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介紹，甚有價值。書中說：「一在強弱以決存亡。蓋天時之寒暑、地勢之高下逐漸改變，惟物類之形體相宜者，強而能存。咸豐九年，達氏著書以明此理，名曰《物類推原》。」並稱讚此書「意深詞達，各國爭譯而廣傳之，今學者多宗其說」<sup>④</sup>。復次，從70年代開始在傅蘭雅所編的科普雜誌《格致彙編》上，發表的《混沌說》(1877年)、《地學稽古論》(1891年)(以上傅蘭雅撰)、《博物新聞·格致精進》(1891年，英國新教士艾約瑟[J. Edkins]撰)、《地理初枕》(1891年，美國新教士卜舛濟[F. L. H. Pott]撰)等文章，以通俗的語言介紹了不少生物、地質進化論知識。特別是《地學稽古論》一文，以近代地質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以今論古，考稽土質中的土石層及陳迹物，把地球分為極古、荒古、太古、近古等四個時期，並推知其年代。文中說：「計生人之初，去今略七八千年，是為近古，生物之初，去今約五六千萬年，是為太古。未生物之前，其年雖不可考，而已為荒古之世。再上推地球初造之時，混沌未分之前，其年歲多至人心不可意擬，其必為極古之年矣。」繼《地學淺釋》之後，再次按人所用的工具，將人類社會分為石期、銅期、鐵期等三大時期<sup>⑤</sup>。傅蘭雅稱生物進化論「理明說通，可以入信」<sup>⑥</sup>，艾約瑟在介紹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後，進而指出「莫謂今不盛〔勝〕於古也」<sup>⑦</sup>。以新教士為主體的寓華西人在一系列譯著和報刊中不厭其煩地介紹西方進化論知識，產生了一定的傳播效果，為一部分中國士大夫所吸收。

1889年上海格致書院春季特課考試，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所命的「格致」考題竟是將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培根、達爾文、斯賓塞等四大科學名家進行比較並追溯西學源流。值得注意的是，獲此次徵文第二名的王佐才觸及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自然選擇」理論。

1889年上海格致書院舉行的春季特課(有獎徵文)，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所命的「格致」考題竟是將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培根、達爾文、斯賓塞等四大科學名家進行比較及追溯西學源流。值得注意的是，獲此次徵文第二名的王佐才觸及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自然選擇」理論。他說：「以動物為植物之所變，而人類又為動物之所變。苟不宜於世，即不能永存。所上古之物，有為今世所無者，即此理也。」<sup>⑧</sup>第四名鍾天緯在課卷中指出：「〔達爾文〕論萬物分種類之根源，並論萬物強存弱滅之理。其大旨謂，凡植物動物之種類，時有變遷，並非締造至今，一成不變。其動植物之不合宜，漸漸漸滅，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為天道自然之理。」<sup>⑨</sup>鍾天緯曾於1879-81年「遊歐洲各國，考其政法、學術及所以富強之故」，回國後，又襄助傅蘭雅、林樂知等西人譯西書<sup>⑩</sup>，堪稱西學的飽學之士。文中說到「萬物強存弱滅之理」，說明他把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與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混淆了。對此，課士

活動的主持者王韜加上「眉批」，給予糾正道：「達文謂眾物繁生，義者常存，所謂義者，宜也，無強存弱滅之說，似欠考據。」由此可見，進化論這一最新的西學知識，到80年代已為部分中國士大夫所吸收，其中，包括清廷中的上層官員（如李鴻章）<sup>⑩</sup>、普通士大夫（鍾天緯、王佐才等）<sup>⑪</sup>，以及洋務政論家、早期維新思想家王韜等。

進化論在思想史上的重大影響，在於它不僅是一種科學觀，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世界觀、歷史觀。王佐才說道：「中國每尊古而薄今，視古人為萬不可及，往往墨守成法，而不知變通。西人喜新而厭故，視學問為後來居上，往往求勝於古人，而務求實際」<sup>⑫</sup>，代表了當時以進化史觀對言必稱「三代」的歷史退化論進行批判的進步思想<sup>⑬</sup>。康有為等維新派繼之而起。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自70年代開始「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sup>⑭</sup>，他說：「生物始於苔，動物始於介類，珊瑚即小蟲所成。」「荒古以前生草木，遠古生鳥獸，近古生人。人類之生，未過五千年。」他將地球的「年紀」分為「荒古」、「遠古」、「近古」三世，與傅蘭雅在〈地學稽古論〉一文中的分期法相似，只不過將四世說改變成了三世說。這大概是他為了附會傳統的「三世」說而進行的改造，他說：「地球之生約四萬年，分三世，曰荒古，曰遠古，曰近古。……《春秋》分三世：有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sup>⑮</sup>正是由於他以進化論為思想武器，才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循環論、退化論改造成了歷史進化論，「以三世推將來」<sup>⑯</sup>，「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孔子之為《春秋》，張為三世，……蓋推進化之理而為之」<sup>⑰</sup>。把人類社會進化視為一種普遍性的規律，由此奠定了他以西方列強特別是近鄰日本為榜樣進行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出身官宦之家的譚嗣同，自幼熟讀經書，「為舊學所溺」，1893年在上海與西士傅蘭雅相識，開始接觸西學，自此「新學灑然一變，前後判若兩人」<sup>⑱</sup>。他說：「究天地生物之序，蓋莫先螺蛤之屬，而魚屬次之，蛇蜥之屬又次之，鳥獸又次之，而人其最後焉者也。」描繪了一幅生物進化的次序圖，並進而悟出了人類強弱相爭之理，「今之時，中西爭雄，中國日弱而下，西人日強而上」<sup>⑲</sup>，從而走上了變法救國的道路。

甲午戰爭一役，一向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打敗了老大帝國，中國亡國滅種之危機空前加劇。康、梁多次強調中國面臨「古今之變局」，激勵士大夫「變法維新」。嚴復開始着手翻譯《天演論》，系統介紹西方進化論（特別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口號，刺激晚清的士大夫團結起來，變法「保種」。結果，進化論便為更多的士大夫所接受，對維新變法運動起到了催化、加速的作用。回溯晚清西學東漸的歷程，1894年前，以傅蘭雅、丁韞良為代表的寓華西人所介紹零星的進化論知識對士大夫的影響，對嚴復系統傳播進化論奠定了必要的基礎<sup>⑳</sup>。

綜上所述，晚清士大夫的變局觀是西潮衝擊下的產物。它首先是在外敵不斷入侵，打破了封建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閉狀態下，士大夫對國際環境或時局發生變化的一種反應和積極態度；其次，它更是在西學東漸中國，並逐漸為士大夫所汲取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其中，有些士大夫的變局觀是建基於進化論之上，成為一種進化的歷史觀、世界觀。以進化論史觀為基礎的變局觀既成

以進化論史觀為基礎的變局觀既成為洋務派和維新派批判頑固派泥古不化的思想武器，也成為他們「變法自強」的理論基礎。儘管洋務派同維新派之間在「變甚麼」、「怎樣變」的問題上認識不同，但是他們已朦朧地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東漸中國的歷史趨勢，進而提出「借法自強」、「變法自強」的口號。

為洋務派和維新派批判頑固派泥古不化的思想武器，也成為他們「變法自強」的理論基礎。儘管洋務思潮內的左右兩翼及洋務派同維新派之間，在「變甚麼」、「怎樣變」的問題上，認識是不同的，甚至有根本的區別，但是，無論是洋務派也好，是維新派也好，他們都正是從「千古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進化論史觀出發，進而提出「借法自強」、「變法自強」的口號。與頑固派的因循守舊、不思變通的觀點不同，他們已朦朧地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東漸中國的歷史趨勢，進而認為西力東漸中國有害有利，要「去害就利」、「轉禍為福，變弱為強」，唯有「借法自強」，這既包含有辯證的因素，又洋溢着一種可貴的發憤為雄的向上精神，代表了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潮<sup>20</sup>。

### 註釋

- ① 魏源：《海國圖志·敘東南洋》，百卷本，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② 徐繼畲：《瀛環志略·凡例》，道光庚戌年（三十年）刊本（台北：華文書局，1968），頁20。
- ③ 黃鈞宰：《金壺七墨》，卷四，見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頁623-24。
- ④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上。
- ⑤ 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載《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79-80。
- ⑥ 李鴻章：〈覆朱久香學使〉，載《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147。
- ⑦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 ⑧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九。
- ⑨ 曾紀澤：〈文法舉隅·序〉，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載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5），頁12-13。
- ⑩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 ⑪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32。
- ⑫ 張之洞：《勸學篇·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6。
- ⑬ 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52-53。
- ⑭ 譚嗣同：〈論今日西學與中國古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98。
- ⑮ 《湘報類纂》，乙集，卷下（上海：中華編譯印書館，1902），頁401。
- ⑯ 有關上海格致書院的情況，見劉學照、孫邦華：〈論傅蘭雅在西學傳播中的貢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21卷（1990）。
- ⑰ 《格致書院課藝》，戊子年卷。
- ⑱ 《格致書院課藝》，庚寅年卷下。
- ⑲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頁386-409。王先生誤將金竺山農當作中國士大夫，實際上，金竺山農是英國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天津《時報》、《直報》、上海《萬國公報》上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之一。再則，先生未將魏源統計在內，因此，筆者把金竺山農換成魏源，總人數仍為81人。
- ⑳ 《道咸同光奏議》，卷十六。
- ㉑㉒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79-80；180-81。

- ⑳ 魏濟：〈利說荒唐惑世〉，載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卷三》（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183-84。
- ㉑ 趙如光：《萬國通鑒·序》，謝衛樓著：《萬國通鑒》（上海：美華書館，1882）。
- ㉒ 據任復興的研究，《瀛環志略》從撰寫到正式刊印前，目前世上共發現有六種稿本，並分別取名甲辰稿、渠藏稿、第三稿、過目稿、校定稿、北圖稿。在甲辰稿中常常出現「夷」字，以後各稿，幾乎都改換別的字眼，如甲辰稿〈英吉利圖說〉僅2,429字，就有21個「夷」字，校定稿〈英吉利國〉達7,819字，已不見一個「夷」字；六種稿本中，徐氏在處理中國在亞細亞及世界上的位置時，進行了處心積慮地修改和掩飾，頗費了一番心思。任復興：《〈瀛環志略〉若干稿本初探》，任復興主編：《徐繼畲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213-29。
- ㉓ 王韜：〈論大地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萬國公報》，復刊第50期（1893年3月）（台灣：華文書局，1968年影印本）（下引同），頁13452-56。
- ㉔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604。
- ㉕⑥ 鄭觀應：〈易言·論公法〉（36篇本），載《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67。
- ㉖ 葉德輝：〈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二），頁649。
- ㉗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就曾組織譯員節譯國際法著作，並自覺利用國際法知識開展禁煙工作，為晚清輸入國際法之始。60年代後，分別在丁韞良和傅蘭雅的主持下，京師同文館和江南製造局陸續翻譯出版了《萬國公法》、《星輶指掌》、《公法便覽》、《公法會通》、《公法總論》、《各國交涉公法論》、《各國交涉便法論》等書籍，西方國際法知識和理論藉此比較系統地傳入中國。
- ㉘ 總理衙門儘管認為「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但是總理衙門在利用丁韞良先譯出的部分國際法知識處理與有約國家（普魯士、丹麥）的爭端中贏得過主動，乃支援和資助丁韞良將《萬國公法》完整地翻譯出版。國際公法也成為郭嵩燾、曾紀澤等晚清第一代駐外使臣必備參考書。另一方面，總署官員、駐外使臣、早期維新思想家、上海格致書院課生先後批斥過西方列強借國際法之名行侵略弱小國家之實的虛偽性，但是，洋務運動時期長期主持對外交涉事務的李鴻章又十分仗恃成約和公法，一味對外妥協和「羈縻為上」。詳見筆者博士學位論文〈寓華西人與晚清社會思想〉，第五章（未刊稿）。
- ㉙ 王韜：〈擬上當事者書〉，載《弢園尺牘》，頁208。
- ㉚⑧ 王韜：〈答包荇洲明經〉，載《弢園尺牘》，頁92；93。
- ㉛ 董琪：〈郵政篇〉，《萬國公報》，復刊第32期（1891年9月），頁12269。
- ㉜ 鄭觀應：〈易言·公法〉（20篇本），載《鄭觀應集》，上冊，頁175。
- ㉝ 陳熾：〈庸書〉，載趙樹貴等編：《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78。
- ㉞ 引自鍾叔河：〈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載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頁14。
- ㉟ 彭玉麟：〈盛世危言·序〉，載《鄭觀應集》，上冊，頁227。
- ㊱ 中國史學會編：《洋務運動》（一），頁222；湯震：《危言》，卷一。
- ㊲ 鴉片戰爭前後的盧坤、林則徐、魏源、牛鑾、耆英及隨後的馮桂芬、曾國藩、李鴻章、奕訢、文祥等人都曾多次談過堅船利炮為西人的長技。
- ㊳ 陳作霖：〈炳燭裏談〉，引自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701-702。
- ㊴ 吳雲：《兩壘軒尺牘》，卷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 ㊵ 盧贛章：《變通推原說》，《萬國公報》，復刊第84期（1896年1月），頁15815。
- ㊶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 ㊷ 林樂知：〈中西關係論略·第四論謀富之法〉，《萬國公報》第357期（1875年10月9日），頁1556-1667。
- ㊸ 林樂知：〈強國利民論第五次〉，《萬國公報》，第417期（1876年12月9日），頁3166。
- ㊹ 李提摩太：〈論中國宜特設商部以振興商務〉，長白仲英采輯：《分類洋務經濟時事論》，卷二，「通商」。

- ④ 金竺山農(李提摩太)：〈論今日誰能助我〉，《萬國公報》，復刊第24期(1891年1月)，頁11699。
- ⑤ 丹皮爾(William C. Dampier)著，李珩譯：《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頁344-45。
- ⑥ 〈西博士新著《人本》一書〉，《申報》，同治十二年閏六月二十九日(1873年8月)。《人本》為達爾文的新著作《人類的由來及其性選擇》。
- ⑦ 雷俠爾(Charles Lyell，今譯萊伊爾)著，瑪高溫、華蘅芳合譯：《地學淺釋》，清同治十三年(江南製造局本)，卷十、十三。
- ⑧ 丁韞良：〈西學源流〉，《西學考略》，卷下，光緒癸未孟夏京師同文館聚珍版。
- ⑨ 《格致彙編》，第六年(1891年)，冬季卷。
- ⑩ 《格致彙編》，第二年(1877年)，卷七。
- ⑪ 《格致彙編》，第六年(1891年)，春季卷。
- ⑫⑬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己丑年)，〈王佐才課卷〉。
- ⑭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己丑年)，〈鍾天緯課卷〉。
- ⑮ 〈鍾鶴笙征君年譜〉，見鍾天緯：《別足集·外篇》，「附錄」。
- ⑯ 70年代，晚清首任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在考察西方學術時，曾粗略地談及達爾文的進化論(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4]，頁386)；長期留心西學的孫寶瑄(李鴻章的外甥)，曾於1894年2月記下他讀了《格致彙編》上傳蘭雅的《地學稽古論》後，所產生的問題和想像：「近今持論者多謂人為猿猴所變，然究不知所謂變者，果形體漸變。」「以同種化為異種之由，大抵以兩種交合，故別生一種。如雉與蛇交而生蛟類是也。意猿猴化人之理，殆亦猿猴不知因與何許物交而故能生人。……」(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60-61。)孫寶瑄如此熱心西學、接觸進化論知識，一般來說與其舅舅李鴻章的影響不無關係，這也可以佐證進化論對李鴻章的影響。
- ⑰ 除鍾、王之外，還有不少接受進化論的普通士大夫。如曾多次參加格致書院課士並獲獎的浙江青年士子葉瀚、葉瀾兄弟，不僅長期究必西學，而且親自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編寫《天文歌略》、《地學歌略》等小冊子，創辦《蒙學報》，對國人傳播進化論、日心說，進行西學啟蒙教育。
- ⑱ 介紹進化論的大家嚴復在1895年的《論世變之亟》中，才表達了同樣的思想，比王佐才晚了整整六年。
- ⑲⑳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載《戊戌變法》(四)，頁114-17；117。
- ㉑ 康有為：《長興學記；桂學答問；萬木草堂口說》(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76、85、92、100。
- ㉒ 康有為：《論語注》。
- ㉓ 譚嗣同：〈與唐絳丞書〉，載《譚嗣同全集》，上冊，頁259。
- ㉔ 《譚嗣同全集》(修訂本)上冊，頁131。
- ㉕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僅僅注意到嚴復翻譯《天演論》，在介紹近代進化論思想中的作用和影響。實際上，嚴復着手翻譯《天演論》，是因甲午中日戰爭失敗的刺激，遲至1894、1895年間才開譯，就是最早讀到譯稿的梁啟超、康有為，也不會早於1895年，而《天演論》的正式出版則已是1898年4月了。故此，筆者以為，在嚴復之前，寓華西人所介紹的進化論知識不僅為王韜、李鴻章等洋務論者所吸收，成為「變局觀」的理論基礎，而且已對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產生了一定程度地影響，成為維新變法思想的理論基石。孫邦華：〈寓華傳播西學的又一嘗試——傳蘭雅在上海所編《格致彙編》述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
- ㉖ 王韜的思想非常具有代表性，見孫邦華編選：《弢園老民自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178-83。